

他者的都市文化地景建構： 三種外籍勞工研究取徑下的地圖分析

戴 伯 芬[◆]

摘 要

本文引用地圖權力學的分析，以三種不同的外籍勞工地圖，來探討他者在台北都市空間中被建構與本身建構的都市文化地景，藉以討論地圖呈現的外籍勞工都市文化地景差異。首先，對於台北市政府所提供的外勞文化地圖進行文本分析，檢視製圖過程中隱而不顯的官方都市治理意識形態；其次，借用勞工局在台北市公共空間，以外籍勞工社會調查的資料繪製而成的外籍勞工分布地圖進行分析；最後，則從中山北路菲籍勞工的訪問調查中，整理出外籍勞工對於都市地景主觀的認知地圖來進行空間分析。透過都市治理地圖、社會調查地圖與空間認知地圖三種不同製圖方式的比對分析，本文試圖闡明不同敘事方法所呈現的他者文化地景差異，以及該差異背後所反映的地圖權力學。

關鍵詞：外籍勞工（foreign worker），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

* 本文 93 年 9 月 13 日收件；93 年 10 月 18 日審查通過。

◆ 本研究特別感謝李淑媚與張景莉同學協助調查，以及王志弘學長的討論意見。

我們相信地圖，以為它代表不容置疑的事實，而與繪圖者的目的及意見無關。這種天真的信念反映了我們忽略地圖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武器，它形塑了我們的生存世界。繪製地圖是一個詮釋的行動……不只傳達了事實，也反映了作者的意圖。（畢恆達 viii）

跨國移民勞動力開放進入台灣已經有超過十年的時間，外籍移民勞工假日集聚所形成的都市新文化地景已經引起不少亞太都市研究學者的關注（Yeoh, Huang, and Gonzalez III 1999; Yeoh and Huang 1998; 大橋健一 1989）。在台灣外籍移民勞工的相關議題，也引起不同領域的研究者注意，研究取向從過去以官方政策與管理的角度，開始轉向一種政策批判的立場（李易昆 1996；劉梅君 2000；林津如 2000；龔尤倩 2002）。在實證的研究方法上多採取實地的社會調查法與深度訪談，對於外勞空間研究，理論關懷的重點有二，一是外籍勞工本身做為社會的底層階級，在公、私不同領域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其透過個別與集體行動改變不利處境的可能性與限制（吳挺鋒 1997, 2002；藍佩嘉 2002）；二是對於外勞形成的都市異文化區進行分析，討論外籍勞工對於都市空間造成的影響（許弘毅 2000；吳比娜 2003；戴伯芬等 2004）。

文化治理已經成為都市公共空間再造的新議題。外籍移民勞工集體聚集在都市重要的地點，透過宗教活動、特殊的消費方式，形成新的台北都市文化地景，也造成全球流動勞工與在地勞工間的市場競爭、以及外來非市民與市民公共空間使用的衝突。在台北，外籍移民勞工集中於中山北路、台北車站與二二八紀念公園。他們佔用市民日常使用的公共空間，如人行道、街道、車站、廣場以及購物中心等，雖然為都市帶來文化多元化的景觀，但也引發市民與外籍勞工公共空間使用的爭議。在外籍勞工引起本地勞工、市民與社區居民不安焦慮之際，地方政府被迫必須回應市民的要求，處理都市公共空間中外籍勞工聚集區的空間議題。從 1994 年開放市長民選以來，地方政府對於外籍勞工假日聚集區政策態度的轉變，不斷透過政策的宣示對於都市中的他者生產出各種文化論述，來做為合法化政權治理的手段，其中官方用以建構外勞文化論述所生產的地圖，正好提供一個考察都市政權移轉下勞動政策轉變的文本。本文即建立在比對兩個不同的製圖

視野——由上而下的官方外勞地圖以及由下而上的外勞認知地圖，來反映都市地景在都市治理者與被治理者間的再現差異。

一、三種取徑的地圖敘事

在選擇分析的文本上，台北市政府所舉辦的外勞詩文比賽，經常被引用做為分析外籍勞工移民經驗的文本（龔尤倩 2002）。不過以文字創作來表達本來就有其論述限制，不但排除了多數不擅於文字表現者，整個文學創作的評比方式也可能受到台灣評審的品味左右。本研究是以三種不同的外籍勞工地圖，做為政策分析的文本，並佐以報紙的時事來進行文本分析。第一張地圖為台北市勞工局委託廠商製作的「外來移民者文化地圖」（Taipei City's Cultural Map for the Migrants，簡稱外勞文化地圖），¹由台北市政府勞工局發行，外勞諮詢中心出版，是一張彩色的解說折頁圖。為了落實對於外籍勞工的保護與輔導，台北市政府在 2001 年製作了外勞文化地圖，提供外勞認識台北都市的指導，並引領他們從事適當的都市休閒生活。這張官方版的文化地圖標示了台北市的文化地景，描繪了官方認為應提供給外籍勞工認識的台北「地景資訊」，包括官方本身對於城市的文化地景想像。

第二張與外籍勞工相關的地圖，是來自台北市勞工局外勞諮詢中心所製作的外籍勞工分布圖，利用社會調查的方法，在全台北市各個公共空間進行外籍勞工的實地調查後繪製，但是僅做為內部的行政參考，並未對外正式發行。台北市政府勞工局當年進行的台北市外籍勞工調查，成果呈現於台北市勞工教育中心的牆面，以及出版「台北市外籍勞工休閒方式及消費形態調查」研究報告（2002）。

第三張地圖則是由研究者在 2004 年五月到六月間，對於中山北路菲籍

¹ 在此的「外來移民者文化地圖」是委外廠商製圖時的用語，事實上指的就是外勞文化地圖。另外在市政府勞工局官方的文宣「台北市外籍勞工宣導手冊」中，中文頁 32，即是用「外籍勞工文化地圖」來稱呼這張地圖，再加上本圖是配合外籍勞工常用的英語、泰語、印尼語、越南語四種語言發行，而不包括台灣外僑人數較多的日語，所以可見這張地圖對於官方製作者的意義應是外勞地圖而不是廠商所用的「外來移民者地圖」。而此處廠商不直接使用外籍勞工地圖或者是外勞地圖，可能是受委託廠商的誤植，或是在製圖過程中試圖跳脫直稱外籍勞工文化地圖的階級意味。

勞工所進行的實地調查，請每一位受訪者描繪他們假日從雇主的家到中山北路聖多福教堂的路徑，以及在此路徑間他們所熟習的地標或建物。雖然認知地圖的繪製是由研究者在一旁予以指導，但還是有很多受訪者以自己不會畫而拒絕，或者只是隨意畫畫，在實際受訪的 60 位菲籍勞工中，有 3 位受訪者拒絕繪圖，有 10 位所標示的地圖只有路徑而無地標，或是地標無法辨認，所以有效的地圖樣本為 48 位，其中女性有 46 位，男性僅占 2 位（結果可以參見附錄一）。

這三張地圖的比對分析，雖然有理論分析的意義，但也須面對方法上的幾個問題：首先是認知地圖方法本身理論的限制與缺點。認知地圖是對於物理環境的空間安排所持的認知心靈架構，其方法起源於 Tolman (1948) 描述實驗中老鼠學習圖像化環境的方法。隨後，林區 (Kevin Lynch 1960) 的經典作品「都市意象」，提出人類對於都市認識的方式，是藉由路徑 (paths)、邊緣 (edges)、區域 (districts)、節點 (nodes) 與地標 (landmarks) 五個要素所組成。雖然認知地圖引起環境心理學界的重視，不過也引發諸多批評 (Appleyard 1970; Byrne 1979; Evans 1980; Pinheiro 1998)。每一個人所完成的認知地圖可以反應他們記憶中重要的環境因子，認知地圖無法完整與正確地呈現物理環境的資訊，其方法的使用與受訪者的繪圖能力與繪圖尺度有關，受訪者的繪圖能力無可避免地會影響與限制地圖的生產 (Blaut & Stea 1974)。由於本研究受訪的菲籍勞工以高教育者為主，其中受過大專教育以上者占 56.7%，中學教育者占 33.46%，研究所以以上與初中以下各占 3.3%，因此請菲籍勞工來繪圖比較具有研究的價值與可能性，雖然如此，大多數的菲籍勞工在面對繪圖的測驗時仍有表現法的問題。

第二是關於認知地圖分析的尺度 (scale) 的問題，不同受訪者的繪圖尺度也會影響到地圖的表現 (Kozlowski & Bryant 1977)。在尺度上有兩個研究方法的問題必須深入分析，一是在實地調查時因為無法訂定統一的比例尺，所以是隨受訪勞工自行發揮，因而在地圖上呈現出不完整的空間意象，有些勞工以雇主家為主發揮，有些勞工則著墨於聖多福教堂週邊的環境。其次，外勞文化地圖與台北市外籍勞工分布圖都屬於外籍勞工整體、全市尺度的空間再現；而認知地圖只是菲籍勞工對於雇主的家到中山北路以及週邊環境的呈現，因而認知地圖只「部份」再現了菲籍移民勞工對於台北市地景的認知，不過，這個認知也是菲籍勞工在雇主家之外，對於台北市最熟習與重要的地景記憶。

最後，因為語言溝通的限制，我們只選取菲籍的勞工做為研究的對象，忽略了台北市其他廣大的印尼籍勞工以及越南籍、泰籍勞工。以台北市外籍勞工國籍分布來看，2002 年總計有 35,649 人，印尼勞工比例最高，有 20,457 人，約占 57.4%，其次是菲律賓勞工，有 7,522 人，占 21.1%，泰籍勞工有 5,701 人，占 16.0%，越南勞工有 1,968 人，占 5.5%。至於不同勞工的業種分配，家庭幫傭多數來自菲律賓與印尼（70%的監護工來自印尼，而 21.1%來自菲律賓），泰勞在營造業中扮演重要角色。所以認知地圖再現的僅是菲籍、女性、家庭幫傭勞工的都市地景，至於其他國籍、男性、其他業種勞工的地景認知差異，則無法在本研究中呈現。

二、外勞文化地圖：打造外籍勞工的都市想像

2000 年，台北市政府製作了外勞文化地圖，目的是向台北市的外籍勞工介紹台灣的文化祭典與台北重要的文化景點，讓外籍勞工也可以享受台北都市休閒生活。這張長 58.5 公分，寬 42 公分，對折後可以放入皮包或順手查看的文化地圖，正面的主頁是封面、市長致詞以及中國節慶介紹，右邊則是四十二個景點的照片與簡介。封面是粉色系的五彩魚與汽車、公車與交通路線構成底圖的標題頁，²揮灑著“Enjoy Taipei Go! Go! Go!”的主標題，副標則是不甚明顯的“Taipei City’s Cultural Map for the Migrants”。以下的方框則標示著“FWCC Is at Your Service”，說明地圖的企劃製作者是某國際有限公司（參見圖一）。文化地圖特別被印製成英文、泰語、越南語和印尼語與四種語言，供不同國籍的勞工可以運用。

主頁下面是民選市長的歡迎致詞，配上市長參加某大會致詞時鼓掌的活動照片，他穿著大紅色改良式台灣原住民頭目服飾，頭頂著飛鼠與高聳羽毛構成的頭飾。³改良的原住民服飾代表對於本土少數族群文化認同的象徵，鼓著來自代表本地原住民族群對於外籍勞工族群歡迎的掌聲。地圖作

² 勞工局委託陳永龍暨外勞休閒消費案工作團隊的「台北市外籍勞工休閒方式及消費型態調查」中，已建議台北市勞工局要「製作多國語言之捷運與公車路線圖，並進行文化地圖改版工作」（66），新版的文化地圖，主題沒有變，只有封面的五彩魚改為一隻遊樂園的飛馬行空，以及若干民俗照片的更換。

³ 原來著原住民服飾鼓掌的市長也改穿大紅色的運動服，平舉起右手致敬。

爲一種被操弄的政治符碼正顯示一位民選市長對於台北市短暫治理權的宣告，化解了隱含的本土原住民族群與外來移民勞動族群在勞動市場的矛盾與衝突。事實上，爲了抗議外籍勞工進入而剝奪本地勞工的就業機會，原住民與本地勞工團體曾多次發起勞工運動，抗議外勞剝奪他們的就業機會。⁴台北市政府還由於進用原住民員額的數量不足，引發媒體的批評。⁵新的都市治理者仍無視於現實社會中原住民對於外籍勞工取代其勞動市場的不滿與反彈，以開放的心來歡迎全球流動中浮現的新都市少數族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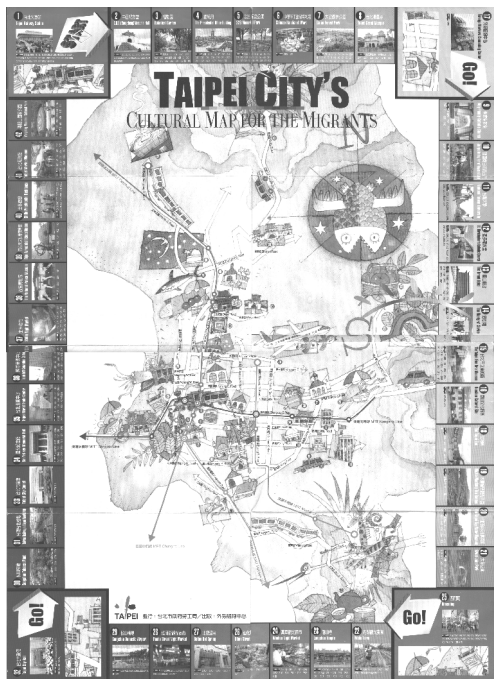


圖一 a 台北市外籍勞工文化地圖正面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勞工局

⁴ 原住民聯盟曾經發動百人至勞委會進行二十四小時靜坐抗議（1996 年 5 月 1 日），之後每年勞工團體一再出現抗議外勞造成本地勞工失業的聲浪，迫使政府制定重大工程須雇用 2% 的原住民才能引進外勞的規定，見《中國時報》1999 年 5 月 6 日：第 9 版。

⁵ 「市府進用原住民落實率低 實施半年僅十八人任職 離百分之五比例相差甚遠」，《台灣時報》1999 年 12 月 8 日：22 版。



圖一 b 台北市外籍勞工文化地圖反面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勞工局

在市長的歡迎詞之下，則介紹中國農曆年、燈節、清明節、端午節、七夕、中秋節與冬至等七個民俗節慶，配上十張彩色的年節照片，包括中國應景的食物，如拜拜的供桌、粽子、綠豆凸、湯圓，展示代表中國的飲食文化；另外則是大紅的中國燈籠、廟前的人群、製作龍型燈籠的師傅、划龍舟、八家將等傳統民俗活動照片，試圖對於城市中他者建構一種「擬觀光客式的」中國文化意象。文化地圖作為城市治理的工具，不免流露出政治利益具現在地圖的符號與神話中，如伍德（Wood）所揭示的地圖權力所言：「有哪位偉大的國王、皇帝，哪個偉大的共和國，不會藉由描繪疆域來標誌其時代的降臨？不論實際的考慮是什麼，它無可避免地也是一種炫耀性消費的動作，一種財富與權力，以及同時代的象徵符號，一種所有權的象徵展示」（伍德 189）。

背面的地圖是以粉米色系為底，以卡通圖案再現各個景點的建築或地景象徵，四周環繞四十二個景點的介紹方塊，分別以紅、橙、黃、綠、藍、靛、紫等彩虹顏色，將方塊再劃分為不同的區塊。四個角落被放大的方塊，則分別放上台北車站、外勞諮詢服務中心、西門町、台北市政府，呈現出一種大富翁遊戲般環遊都市格局，將原來具特定目的的地產買賣遊戲，轉化為朝聖般的都市文化旅程。台北車站同時作為起點兼終點，跳過直線前進的邏輯，恣意地在外勞諮詢服務中心、西門町、台北市政府停歇，各景點則被編上數字，並選擇卡通畫式的建築符號或代表性的文化符碼標示於圖上。圖上的數字編號既不代表空間的順序，也未指涉真實空間中的區位、距離、移動方向性。地圖與真實空間的相關性被抹除了，再現的地圖是為流動勞工、過客所繪製的無目的的城市漫遊。

這趟旅程從台北車站開始，以捷運和公車系統環遊台北市區。台北市政府選擇的外籍勞工賞景地點，反映了台北市政府試圖在外籍勞工面前展現的城市歷史與文化，與試圖為他們建構的台北地景意象。四十二個景點可以依不同空間的機能與屬性被分為九類：

1. 交通設施：台北車站、松山機場與台鐵台北機廠。
2. 紀念性建築與地標：中正紀念堂、忠烈祠、國父紀念館、圓山大飯店。
3. 綠地與主題公園：植物園、228 紀念公園、大安森林公園、台北動物園、大湖公園。
4. 政府機關：總統府、外勞文化中心、市議會、台北市政府。
5. 文教設施：中國工藝館、台北自來水博物館、國立歷史博物館、台北海洋館、台北市立美術館、華山藝文特區、松山煙廠、士林藝文官邸、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和國立台灣大學。
6. 宗教機構：台北清真寺、聖家堂、聖多福教堂、龍山寺。
7. 市集與特色街區：建國假日花市與玉市、西門町、迪化街、萬華夜市、饒河街夜市、士林夜市。
8. 商業展覽場：台北世貿大樓、台北國際金融中心。
9. 休閒農業與生態地景：貓空茶園、內湖農園、北投溫泉、陽明山國家公園。

所有地圖的製作過程都無可避免地呈現了製作者所欲呈現的地景。相較於台北市的觀光地圖來看，文化地圖與一般提供給外來觀光地圖的差異有以下數點：

1.提供宣傳性的交通設施：台北車站除了作為外勞城市旅遊的起點與終點，也是核心地標，更是市府鼓勵外勞聚集的場所。捷運則成為連通台北城市最重要的經緯，也是標訂各景點的原始座標，但是各個景點與捷運站的相關位置卻被省略，僅提供各景點可及的公車路線。此外，相關的交通設施還介紹了松山機場，松山機場是專提供國內航班的國內機場，專供商務與返鄉通勤之用，並非一般市民日常生活的交通運具，更遑論作為外籍勞工跨區域流動使用。而台北東區的松山火車站反而在地圖上被忽略了，松山車站是東部幹線的起點，也是台北東區的交通門戶。至於連通台北縣的板橋車站以及台灣其他縣市間的中、長途巴士等公路客運系統轉運站，自然也被排除於地圖外。這種基於城市行政邊界對於地圖所進行的現實分割，經常是製圖者自繁雜的空間中有意的選擇，反映了製圖者隱而不顯的政治目的——建構一個孤立於外部區域環境而又內部四通八達的台北城市。

2.介紹一般觀光客的熱門觀光景點：過去重要的紀念性建築與政府行政機關，如總統府、國父紀念館、中正紀念堂與忠烈祠，這些被視為國家威權統治的象徵地景，已經轉化為觀光旅遊的景點，並開放其廣場做為一般市民生活日常休閒活動空間，這些重要的地景再現了台北的偉人歷史，反映市民日常的休閒活動，也被介紹給不具有市民身份的外籍移民勞工使用，向外籍勞工宣示台北市曾經有過的偉人與英雄事蹟。

3.推廣國民旅遊的城市休閒生活：日益普遍的國民旅遊形式也是介紹給外籍勞工都市旅遊的重點，包括大型的都會綠地與主題公園，如植物園、二二八紀念公園、大安森林公園、大湖公園與動物園等這些都市日常休閒活動的地點，與晚近興起的市郊休閒農業，如木柵貓空觀光茶園、內湖觀光農園、北投溫泉以及陽明山國家公園，這些位於台北市郊的特殊農業與文化地景不僅成為都會區市民體驗野趣的地點，也成為市府欲提供給外來勞工體驗市民休閒生活的捷徑。但是在缺乏交通工具、體力，以及有返家時間限制的外籍勞工，實在很難以輕鬆的心情參與假日經常陷於車陣中的自然野趣。

4.介紹一般市民的消費生活：與日常消費活動的夜市、觀光市集，像是建國花市、玉市、萬華夜市、士林夜市、饒河街夜市，這些地點不僅是市民休閒消費的場所，也是獲得廉價物品與流行資訊的來源。但是夜市的活動時間經常已經超過外籍勞工必須返家的「灰姑娘」時間（通常是晚上八

點，有時會提早到六點），所以向外籍勞工介紹台北夜市，只具提供他們空間想像的功能。

5.引介與外勞相關的政府組織與宗教團體：與外勞行政相關的政府組織，像是台北市政府、市議會、外勞諮詢服務中心，以及社會服務宗教團體，如清真寺、聖家堂、聖多福教堂，也是市府利用地圖引介外勞進入台北市資源服務的重點。將政府機關與宗教服務團體做浮光掠影式的景點介紹，一方面淡化了市府作為管理外勞權責機構的角色，例如與外勞最直接相關的入出境管理與檢疫醫療設施卻不在地圖中呈現，另一方面也掩飾了台北市民社會對於外來移民勞工的冷漠，除了教會體系外，非營利組織與社會公益團體服務對象是排除了都市外籍勞動人口。

6.特別強調市府近年的文化建設與經濟地標：台北市的相關文化設施與市府近年文化建設成果是文化地圖中對外勞宣傳的重點，在 42 個景點中即佔了 11 個景點。從過去的故宮博物院、中華手工藝品博物館、台北市立美術館等傳承中國歷史文化的傳統宮廷藝術與都市精緻藝術，到新興的台北自來水博物館、台北天文科學教育館、台北海洋館等教育文化主題館，與正在轉型而爭議不休的華山藝文特區、士林官邸與松山菸廠，以及因日據時期員工專用的澡堂而被新列為市定古蹟的台鐵台北機廠。這些為都市中產階級所關的文化展演設施與文化沙龍，有的正從過去菁英文化轉向大眾文化的過程中邁進，有的仍訴諸都市中產階級的文化品味與文化消費，有的則是懸而未決的文化保存議題，全部劃入文化地圖中，用以向外籍勞工宣示台北的文化政策，以及建立台北作為文化城市的表徵。此外，作為國際貿易與金融中心的表徵，除了台北世貿大樓外，台北金融大樓——當時正在興建中的台北東區新地標，也被刻意列入誇耀台北城市現代化與經濟進步之列。諷刺的是施工中的台北金融大樓還因為施工期間意外頻傳，造成多名勞工死傷、並波及市民的意外，⁶被社運團體要求於 2002 年國際工殤日（四月二十八日）建立一座工殤紀念碑。

市府為外來的新移民勞動人口所欲建構的台北文化地景，再現於這張

⁶ 從民國八十八年七月到九十二年十一月間，已經被勒令全面停工三次，局部停工達二十二次，罰款金額總計達三百六十一萬元。其中最嚴重的一次是在 2002 年三三一地震中，造成五名勞工罹難、七名勞工受傷。資料見《聯合報》2003 年 11 月 22 日：B4 版；《聯合報》2002 年 4 月 27 日：18 版。

客觀的、免付費的、可摺疊的方寸大小文化地圖中，成為指引外籍勞工接收、認知台北城市的重要指引。這張以台北城市行政邊界而恣意切割現實城市的地圖，介紹的是一日遊式的景點觀光與市民休閒空間，加上淡化處理的外勞行政與宗教團體資源，以及強調市府文化與經濟建設成就，包括轉型中與爭議中的文化建設，和已經完成與未完成的指標性經濟建築。關於地圖如何將文化的自然化過程，蒙摩尼爾（Mark Monmonier）有一段精闢的見解：「用地圖說謊不但容易，也是必要的。想要在平面的紙或螢幕上，描畫出複雜的三度空間世界有意義的關係，地圖就必須扭曲現實。作為一個比例模型，地圖必須使用幾乎總是比所代表的特徵要大或密集得多的各種符號。為避免緊要的訊息隱匿在細節的迷霧之中，地圖必須提供一個對現實有選擇性、不完整的觀點。沒有什麼辦法可以逃離製圖的弔詭：為呈現一有用且真實的圖像，一張準確的地圖必須說白色謊言」（qtd. in 伍德 126）。

文化地圖提供了浮光掠影式的觀光景點介紹，排除登山、健行等較耗費體力的市民休閒活動，也省略了住宿與餐飲服務資訊介紹，甚至對於各個景點的開放時間、進入限制、付費與否、交通時間等基本資訊都被有意地簡化了，形成一張精緻而美麗、象徵性且示意性的文化地圖。使用者外籍勞工消失了……，外籍勞工被視為單純的都市觀景者——過客，並非城市旅遊業者所仰望的消費觀光客，沒有觀光服務設施，只有卡通式的地景象徵符號，沒有細緻的城市脈絡導覽，只有建築立面與展示的文物櫥窗、不合邏輯的市民日常休閒以及炫耀式的文化政績。

三、外籍勞工空間分布圖：都市日常生活路徑中的他者

第二張外籍勞工的社會調查地圖是利用社會科學的方法，在台北市各個公共空間進行實地調查，以了解外籍勞工在台北市分布的地點，目的在於提供行政人員一個「科學的」行政指導，以社會科學方法的邏輯來達成「了解」以便「預測」，「預測」以便「控制」。地圖做為決策的關鍵，正如同伯汀（Bertin 1981）所提到的「地圖不僅是一張圖畫而已；它是決策過程，一種有時會很沈重的責任」（qtd. in 伍德 310），地圖製作的目的在於賦權（empowerment），即以社會科學的調查的成果為依據，提供一個客

觀的公共決策的基準。社會科學的調查方法充分展現出勞工局的社會行政專業——所有的外籍勞工行政是建立在官員們所稱的「翻轉的行政實驗」上，即經由行政運作機制與服務方案設計兩個方面來調整地方政府對於外籍勞工管理的角色，而了解外籍勞工的分布則是設計服務方案的重要步驟之一。對於外籍勞工諸多進步政策與方案的執行，其實是中央與地方政府微妙的政治角力氛圍中而形成的都市治理策略，以地方政府具有科學的專業社會行政，來對照中央政府「人權政府」的人權限制，是缺乏「分析問題結構」、「改變結構」的外籍勞工「控制管理」（龔尤倩 256-57）。

雖然文化地圖為外籍移民勞工勾勒了一幅動人的台北文化地景圖像，但多數的外籍勞工卻是無暇漫遊城市的，更遑論檢視文化地圖與真實空間的差距。依行政院勞委會「台灣地區外籍勞工管理及運用調查報告」（1999）顯示，在台北市外籍傭工的休假方面，有 35.7% 的外籍傭工根本沒有休假，57.4% 只有部份休假，只有 6.3% 有固定的休假。因此市府為外籍勞工所製作的文化地圖只能提供部分具有休假權的外籍勞工使用，多數無休假的勞工只能停留於勞動的家戶或社區中，循一成不變的勞動路徑來理解都市中社區日常生活紋理，或藉由媒體報導來理解客居的陌生城市。

至於，有休假權利的勞工也必須考量回歸工作崗位的時間，小心翼翼地避開週休假日熱門觀光景點的車陣與人潮。他們可以在都市集體現身的地點通常是有侷限的。依據市府勞工局的調查，台北市外勞經常集聚的地方如圖二所示，可以看到外籍移民勞工的活動多半屬於分散式、社區型。較具規模的大規模團體活動則可見於宗教信仰地點、商業消費空間的廣場與宿舍附近，而小團體聚集地點則在社區鄰里公園、公共空間。台北市外籍勞工最常集聚的地點可以分為四類：

1. 宗教信仰地點：

台北市的清真寺、聖多福教堂、聖家堂不僅是市政府文化地圖所標示的宗教景點，也是現實生活中外籍勞工在假日集聚的宗教與消費空間，更是外籍勞工發展集體行動的據點。聖多福教堂建於 1967 年，由美國建築師安東尼設計，用以提供美軍顧問團員與其家屬週日做禮拜之用。由於提供英文彌撒，所以漸成為吸引菲籍天主教外籍勞工參與禮拜之所，每個假日約有五場禮拜，每場參與人數約有一千人，依勞工局的估計（2001），其

中屬於台北市的外籍勞工約占 51.1%，北縣占 34.0%，桃園占 7.3%，其他縣市占 7.6%。教堂不僅是個人心靈的撫慰，也是實際爭取勞動權益的組織集結場所，如天主教職工中心提出一萬六千名外籍勞工連署書要求提高基本工資、天主教外籍勞工權益中心對於外籍勞工薪資含膳宿措施的抨擊。

清真寺假日也不時有百餘位印籍回教外籍勞工參加祝禱，尤其是回教開齋節（2002.12.16），參與的教徒更多，清真寺也因而被台北市政府劃為古蹟保存區。對於在清真寺庇護中心的女性回教印籍勞工，會要求她們嚴守回教教規，一天進行五次禮拜外，連出門也要求她們著頭巾。相較於教會做為外籍勞工爭取權益的組織，清真寺雖然是受虐外籍勞工都會隱遁之所，但也可能是另一種宗教的禁錮婦女形式。

2. 交通轉運站間的消費空間：

除了中山北路以外，台北車站、忠孝東路四段 Sogo 百貨公司前廣場，不僅是台北市重要的消費人潮集聚所在，也是外籍勞工集聚的地點。中山北路是菲籍勞工在教堂集聚所發展出來的都市假日消費地景，台北車站因位處交通轉運中心，火車站大廳成為各國外籍勞工的聚集中心。

3. 宿 舍：

根據台北市政府 1999 年的調查，從內湖、南港到北投工業區的主要工業帶是製造業外籍勞工集中的中心。位於南港的外籍勞工宿舍也成為一個暫時性的外勞小社區。這是台北市唯一可見的固定外籍勞工宿舍，也因此在此週邊發展出服務外籍勞工的小吃等日常服務。由於近年工業區轉型，製造業外籍勞工有縮減的趨勢，連帶著外勞的社區也跟著逐漸消失。

4. 社區鄰里公園：

外籍勞工集聚於台北市大型住宅區附近的鄰里公園，但與本地居民的衝突並不明顯，只有中山北路、台北車站與蘭州街偶見居民零星的抗議。全市十二個行政區的鄰里公園都有外籍勞工集聚的現象，顯示外籍勞工集聚的活動分布與受僱家戶與社區相關。但是外籍勞工與本地居民的主要衝突是發生在家戶之間的勞資關係，外籍勞工與他們所看護對象受虐的新聞時有所聞。台北市政府為解決受虐外籍勞工的收容問題，特別在台北市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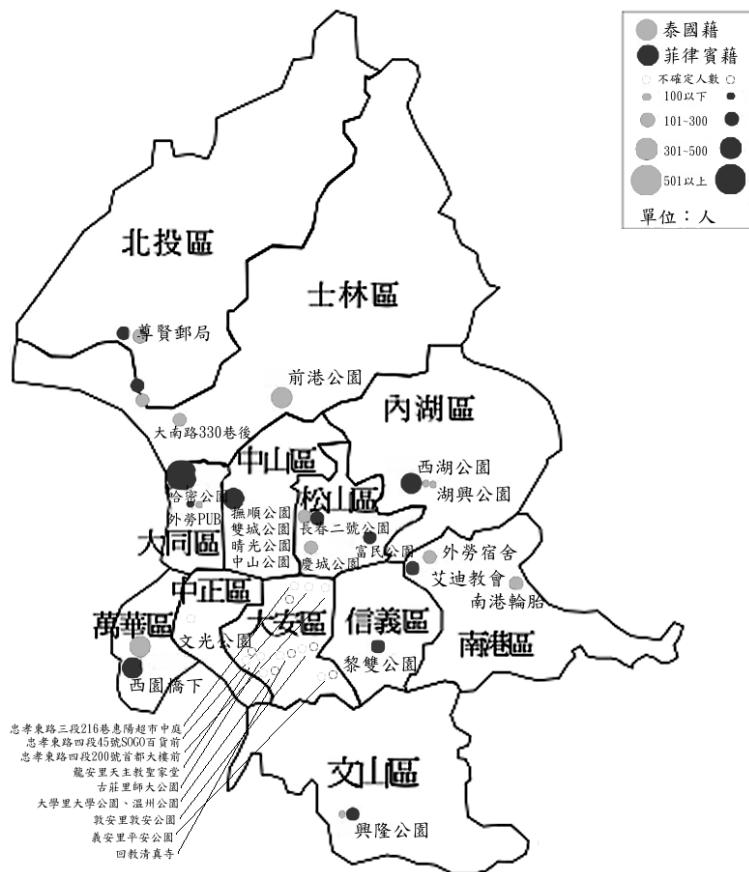
立新事福利服務中心與清真寺兩處外籍勞工庇護中心，而自 2002 年初運作以來，一年約各收容 50 餘位、68 位受虐外籍勞工，占總外籍勞工人數的 0.2%，此數字仍為都市外籍勞工受虐的低估值。而 2003 年轟動一時的劉俠因印籍看護虐死案，更暴露台灣社會福利體系的根本問題。不論是外籍勞工或受看護的對象這兩個社會弱勢團體本身因為制度上的問題，反而形成對立與衝突。

5. 外籍勞工為主要消費的異國商店：

星期天的消費活動被視為外籍勞工在後台自我培力的一種方法（藍佩嘉 2002）。雖然，做為城市消費者，外籍勞工應具有與市民同等的消費權力，但是卻無法抹除來自多數市民對於外籍勞工在城市集體出現的不安。因此外籍勞工也逐漸發展出屬於自己餐廳、小吃店、酒吧，來形塑屬於外籍勞工自身的城市休閒空間。餐廳與小吃主要分布於中山北路，德惠街上過去經常停有張貼著“PLAT-INUM DISCO”或“G.M.E.DISCO”的小巴士可接送做完禮拜的外籍勞工前往舞廳，其中最負盛名的是位於大同區承德路上的「敦煌石窟」。近年來雙城街的外勞文化中心附近也出現了大約十家的外勞餐廳與「地下室」的舞廳。台北火車站的二樓金華百貨，是印尼外籍勞工的消費中心，也有不少菲籍勞工聚集。在外籍勞工專屬的酒吧中，可以在母語的音樂環境中交談，在相似的面孔中找到認同與慰藉，經由我群的集中消費，可以在異域城市中創造外籍勞工具有主動區辨自我與他者權力的消費空間。

大多數市民對於外籍勞工在公共空間聚集的現象卻持負面的看法，認為應該勸導外籍勞工離開公共空間。以台北車站為例，根據一項市議員秦麗舫研究室所做的調查發現，⁷台北市市民對於台北車站內外籍勞工集聚的看法，有 89.6%認為都市空間出現的外籍勞工次文化是一種負面形象，有 24.4%覺得髒亂、吵雜，28%會出現莫名的害怕，有 16.8%會擔心形成治安

⁷ 《中國時報》2000 年 4 月 27 日；《聯合報》2000 年 4 月 27 日；《民生報》2000 年 4 月 27 日。該調查是在 2000 年 4 月 23 日當天於台北火車站內進行，訪問了 20-45 歲進出火車站的民眾，回收 272 份問卷。



圖二 台北市外勞空間分佈圖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工教育中心

的隱憂，39.2%的人認為會影響進出車站的不便。市議員秦麗舫在議會對於市府提出質詢時，甚至說道：「台北車站，做為外籍勞工假日野餐、休閒的據點，車站內可以看到他們四處席地而坐，吃東西、打牌或是談天唱歌，漫無秩序，台北車站宛如一座外籍勞工收容所。」因此建議市府：「應更加關心這些外籍勞工，如製作外籍勞工假日休閒手冊，讓外籍勞工知道台北市不是只有台北車站可以野餐。」由此可以看出多數的市民，甚至是民

意代表，對於都市中集聚的他者是帶著不安的心理與排拒的態度。對於如何改善外籍勞工聚集的方式，則有 50.4%建議採柔性勸導，39.2%認為應採強制手段。一般市民對於外勞在公共空間聚集的現象反感，甚至主張動用警察權來管制，則顯現市民對於外籍勞工集體活動的不安與焦慮。

外籍勞工在公共空間集聚所引起的爭議，反映外籍勞工與市民間對於公共空間使用的衝突。外籍勞工在台北車站的聚集所引發的效應關乎公共空間的使用與界定問題。當公共政策試圖跨越市民與外籍勞工的群我之分辨時，將會面對在地市民的市民權與流動勞工的人權之間的衝突，一方面，城市中的他者具有集體再現的慾望，希望可以透過集體行動而獲得身份的認同，並藉此形成異域中想像的社群；但另一方面，他者的集體行動會引起市民的焦慮，造成更複雜的公共空間使用衝突。當多數的外籍勞工自然在公共空間聚集，並在市府的同意與背書下使用公共空間時，市民卻將他們視為都市中公共空間的都市景觀問題，甚至引發市民心理上恐懼與不安全的反應；相對的，外籍勞工也會藉由自身的消費而在都市公共空間中製造區別，甚至形成具封閉性高的消費空間，來強化都市中的自我認同。這種因為族群差異所造成的社會心理隔離效應，不論是在公共空間、社區或是家庭內，才是市民與外籍勞工區辨自我與他者，我群與他群最主要的空間界線。

四、認知地圖：他者主觀建構的都市地景

本研究的認知地圖，是請假日在中山北路活動的菲籍勞工，畫出從雇主到中山北路聖多福教堂的路徑與其間重要的地標或建築物。有些菲籍勞工比較著重於中山北路週邊地景的描繪，有些則是對於雇住家，或者雇主家到中山北路間的路徑描繪。這張地圖的製作是出於研究者對於他者都市地景的認知興趣，想要理解都市中的他者如何理解城市，透過什麼方式來辨認都市。其中隱含了一個本地的、受過空間訓練的研究者對於外來移入的都市底層勞工研究興趣，也預設了菲籍勞工可以輕易地透過圖畫的方式表現出他們對於城市的意象。但對於大多數未受過空間訓練的菲籍勞工而言，繪圖的表現法是一項難度很高的工作。有一位拒訪的勞工直接了當地說：「我不知道哪裏是東邊，哪裏是西邊，我根本就不知道哪邊是哪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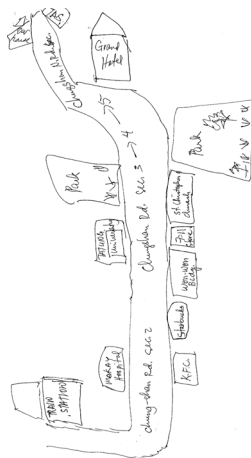
（“I don’t know where is east, I don’t know where is west, I don’t know where is where.”）。她認為自己根本畫不出來研究者所設定的主題。

研究者也在調查過程中發現外籍勞工對於空間的認知，可能不是來自片斷的單一道路或者是地標，而是綜合了空間的距離、方向與整體的空間感所得到的整體來做判斷。因此本研所得到的菲籍勞工認知地圖有很多只是菲籍勞工本身腦海中支離破碎的街道名稱與地標，因而落到繪圖的表現手法時，大多數勞工的空間認知也變成破碎而無法連貫的符號，這也是研究的困難與限制。其次，是研究者在整理資料時面對的困難，因為繪圖是開放性問題，所以有部份菲籍勞工所畫的地標不在筆者的研究範圍中，在以歸納法呈現之時，不得不有所取捨。因為外籍勞工主要生活圈是在雇主家的社區空間中，所以部份受訪者會比較清楚描繪個別雇主週邊環境者，可能因為其環境獨特性而被作者裁減了，或者是因雇主家在台北市以外的地區，超過本研究的地理範圍而被捨棄。對於菲籍勞工的認知地圖也是透過研究者有意的剪裁、重新分類所獲得的結果，其中自然也捨棄了一部份不在研究者分析架構中的資訊，而呈現出研究者有興趣再現與詮釋的地圖，而這些經常是有意選擇、經過相當組織化了的地圖，而不是那些標示不清、方位有誤的地圖。而那些有錯誤的地圖或許正顯現了菲籍勞工對於週邊都市環境訊息的貧乏，是由於她們缺少休假或者是受限的休假時間造成的。

從 48 位菲籍勞工所呈現的認知地圖中，我們可以發現台北車站（16）⁸ 與捷運車站（10）是兩個重要的交通設施地標，台北車站是多數轉乘勞工的地標，另外，也有一位受訪勞工標出松山車站、一位標出板橋車站，所以顯示除了捷運與公車之外，火車站是受訪者可以清楚辨識的交通地景。對於搭捷運而來的勞工而言，民權捷運站是重要的交通節點，可以很清楚地標示出民權捷運站到聖多福教堂的街道與建築（如圖三a，個案 60），雖然這個認知地圖與實際地圖比較是南北倒置的。至於搭公車而來的菲籍勞工，則對於台北車站到中山北路間的交通動線十分清晰（如圖三b，個案 46），台北車站到中山北路間已經形成一條菲籍勞工的假日主要動線。他們通常在第一次到聖多福教堂時是有其他朋友帶領，知道了公車的號碼之後，再來就是得在中山北路的林蔭大道上找到下車的大同工學院，而人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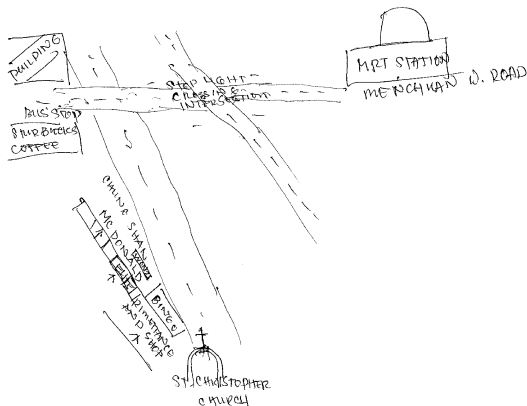
⁸ 此處數字是指受訪者提到的個案次數分配值。

道上顯目的集聚菲籍勞工人群，自然就成了他們重要的辨認標誌。



圖三 a 菲籍勞工認知地圖 1

資料來源：調查個案 60



圖三 b 菲籍勞工認知地圖 2

資料來源：調查個案 46

關於菲籍勞工在圖上所繪的台北市地標，可以分為中山北路與中山北路之外的台北都會區兩個部份來檢視。首先從中山北路的地標來看，麥當勞（26）與萬萬百貨公司（Won-won Dept. Store）（22）是中山北路兩個最顯目的地標，在地圖上可以被指認出來的次要地標為賓果雜貨店（Being-go）（14）、統一超商（7-eleven）（12）、菁英快遞（EEC Elite Express）（12）以及兩家連鎖的服飾店Hangten或佳紡（Net）（7）、星巴克（Starkbucks）（6），而辨識度較低的其他鄰近設施，尚包括區位較遠的儿童育樂公園（3）、中山美術公園（6）、菲籍酒吧（3），匯款機構除了KFC銀行（KFC Bank）⁹之外，還有一些是在萬萬百貨內的地下匯款公司，很多菲籍勞工只有在圖上寫“remittance”，並未標示任何名稱。佔地面積廣大的中山美術公園在很多菲籍勞工的地圖上都有出現，但只知道有個公園，並不知道其名稱，兒童育樂公園則是比較可以被指認出名稱的開放空間，至於外籍勞工文化中心外的雙城公園卻未被標示，有可能是因為其不在通勤的動線上，所以才沒有出現。從菲籍勞工所繪製的中山北路地圖上，我們發現菲籍勞

⁹ KFC Bank為菲律賓的匯款機構之一，在台灣是屬於地下經濟。

工對於中山北路的認知地圖表現了兩個空間特性：首先，菲籍勞工在中山北路所認識的地標是以菲式消費性商店為中心，蜜果是早期開設的菲式雜貨店，菁英快遞則是菲國有名的連鎖商店，兩者以販賣菲律賓食物、飲料、音樂、書報與日用品為主，是菲籍勞工購買母國產品最重要的途徑，而萬萬百貨做為重要的菲籍購物中心，已經成了聖多福教堂以外最重要的文化認同。至於鄰近的晴光市場幾乎未出現在認知地圖上，只有一位菲籍勞工在地圖上標出“market”，知道有一個傳統台灣市場在附近；其次，被菲籍勞工接受的消費文化以跨國的連鎖商店為主，麥當勞做為美式消費文化的代表早已廣為菲籍勞工所接受，另外一個位置較遠、價位較高的星巴克咖啡也出現在多位菲籍勞工的地圖上，至於統一超商、Hangten與佳紡等知名連鎖商店，也是菲籍勞工描繪出來的重要地標，但中山北路等特色婚紗店則不在他們的地圖上，只有在位菲籍勞工的地圖表現出來（個案 36）。

另外，在中山北路以外的都市地景，則是以雇主家為中心，所呈現的重要地標，從圖上可以發現出幾種重要的地標類型，除了公車與捷運車站之外，首先是雇主家附近台北重要的景點，除了標示出雇主家的路名（甚至是住址）之外，許多受訪者都會連帶標示出週邊的重要的地標，這些菲籍勞工所指認出來的地標包括中正紀念堂、陽明山、饒河街與士林夜市、建國花市、台北 101、大安森林公園等等，可以說明菲籍勞工在陌生城市會用城市地標來定位自身僱主的「家」。其次，出現頻率較高的是警察局（7），地方警察局做為管理外籍勞工的基層機構，形成菲籍勞工在社區的監控機制，也為多數菲籍勞工強烈地意識到，所以會特別在地圖上呈現出來。再來就是附近的本地銀行（6），大概是因為多數的菲籍勞工都會想到銀行匯款的問題，所以雇主家附近的本地銀行自然也會被注意到。其他可以被認識到的地景就是與他們工作有關的學校（6）、醫院（4）、鄰里公園（4）、超市（1），在雇主的家與醫院、學校間通勤往返接送病患或小孩是外籍勞工重要的工作路徑，而鄰里公園、超市也是他們倒垃圾、帶雇主人散步或採買的工作路徑。很明顯的，菲籍勞工對於雇主家庭週邊環境的認知，受到其日常生活工作路徑的影響。在城市中勞動的目的性散步成為外籍勞工最主要的休閒，由宿舍走到工地，由家戶走到社區的市場、學校，由醫院走回家。外籍勞工無所不在地漫步於都市的勞動與日常生活路徑中。做為社區與城市中匿名的陌生人，外籍勞工的剪影也不時出現在搭公車或捷運時，在公園推著他們照顧的病患散步時，在超級市場等待付款時，在公

共電話談話時，或在街角的鄰里公園等待垃圾車時。

五、結論：解讀觀看他者以及他者觀看的都市意象

地圖做為一種敘事方式，反應了製圖者隱而不顯的動機與企圖。本研究利用公部門與研究者對於都市外籍勞工聚集區所製造的文化地景，以三種不同研究目的、不同研究方法所繪的外籍勞工地圖為文本，來進行外籍勞工與都市空間的論述分析。在方法上，除了配合整體外籍移民勞工的相關研究與報導，以官方為外籍勞工所製作的文化地圖、社會調查地圖做為分析的文本之外，本研究也特別針對中山北路菲籍勞工進行認知地圖的實地調查，藉此來反映菲籍勞工在都市活動中所認識到的都市地景。這三張地圖的比對分析，可以呈現三種不同外勞的都市文化地景樣貌。外勞文化地圖可以說是市府試圖為外籍勞工所製造的都市文化地景，是官方認知與希望外籍移民勞工可以認識到的台北地景；台北市外籍勞工分布圖則是外籍勞工實際日常生活空間的展現，是客觀社會調查下的產物，呈現出外籍勞工日常生活與聚集的都市公共空間；認知地圖則可用來測試菲籍勞工主觀的都市意象，以菲籍勞工為例，可以理解外籍勞工認識到的台北文化地景。

當市政府試圖透過外勞文化地圖來建構外籍勞工都市文化地景之時，外籍勞工在平時的生活與工作路徑、假日的社會活動與休閒消費中，已經自行建構了對於台北都市地景的認知。檢視市府所製作的文化地圖時，可以發現根本無法提供外籍勞工都市休閒活動資訊，不足的訊息使得大多數的外籍勞工無法按圖索驥，到達城市旅遊的景點，也讓外勞文化地圖僅具有高度的政治象徵與宣示作用，而不具實際的城市導覽功能。

外籍移民勞工的都市休閒與文化活動仍集中於中山北路與台北火車站週邊，更多時候是分散在日常生活的勞動路徑中。因為底層服務業不在勞動基準法的保障範圍，大多數是沒有休假或不足休假，他們的休閒活動更受到勞動條件的限制，具有高度分散於社區的特性，外籍移民勞工是在城市的日常路徑中漫步，透過有限的勞動路徑來認識城市。

而菲籍移民勞工對於都市地景的認知，則是集中於具有連結母國產業與全球化連鎖企業的消費地景，前者如菲式的雜貨店、小吃等，可以建立

異鄉與母國的連帶，強化對於國族的認同；後者，如麥當勞、星巴克以及統一超商等，則可以讓菲籍勞工在跨國企業的都市服務網絡中，暫時摒除外籍勞工社會底層的身份，以消費者的身份進入市場。另外，社區中的警察局、銀行、醫院、學校，都是他們可以在地圖上辨認出來的地景，尤其是雇主家附近的警察局，是菲籍勞工意識到的都市監控機構，也成為繪圖中重要的地標之一。

地圖製造是一種空間建構的過程，涉及了製造者有意再現的空間地景。關於不同的目的、研究方法與表現法的地圖，背後都有隱而不顯的政治目的或者利益，從三張地圖所呈現出來的他者都市文化地景，我們知道官方的地圖只是一種官方政權治理的手段，一種科學決策的佐證，對外籍勞工與本地市民進行都市行銷的策略。而相反的，菲籍勞工的認知地圖所呈現的都市意象，則是零碎、片斷化、有限的都市空間認知，認知地圖的簡化，除了顯現菲籍勞工受限於勞動條件而僅能在特定的時空進行休閒活動之外，也可以看出外籍勞工的假日集聚區是一種內聚的集體行為，試圖對於都市公共空間的短暫佔用來顯現他們的存在。不過，即使是學者看似客觀中立的研究所做的認知地圖分析，也只是一種經過選擇、裁剪與有目的詮釋的空間再現。無論如何，做為城市的旅人，外籍移民勞工終究是有限的過客，置外於城市觀光客與市民雙重身份與角色認同。

附錄一 菲籍勞工認知地圖的地標分析表

問卷編號 /地點	捷運站 MRT Station	台北車站 Taipei Main Station	寶萊 俱樂部 Being-go	統一超商 7-11	萬隆百貨 公司 Won-won Dept. Store	麥當勞 Mc Donald	菁英快捷 EEC Elite Express	KFC 銀行 KFC Bank	佳勃 (Net) Hangten	中山美術 公園 Taipei Art Park	兒童育樂 公園 Children's Recreation Park	星巴克 Starke- Buck	菲式小吃 Filipino pub	中正紀念堂** Chang Kar-Shek Memorial Hall	陽明山 Yang Ming Maintain	醫院 Hospital	學校 School	警察局 Police Station	百貨公司 Dept. Store	夜市 Night Market	綠聖公園 Park	本地銀行 Local Bank	其他交通 設施 Other Traffic Facilities
001	○		○	○	○	○				○	○			○		○		○			○		
002	○			○										○							○		
003		○				○														○			○
004						○																	
005	○	○																					
006																		○					
007	○	○																					
008			○		○	○												○					○
009*															○			○		○			
011			○	○	○	○			○														
012	○	○				○													○				
013	○	○			○																		
015	○													○									
017				○																			
019	○	○	○		○		○																
020	○	○		○																			
021			○	○	○	○	○		○	○													
023	○	○																					
024	○													○					○				○
029		○																					
030																						○	
031																		○					
032		○		○																			
033		○			○																		
034				○	○	○				○							○						
035			○		○	○					○						○						

引用書目

- Allen, John, Doreen Massey, and Michael Pryke. *Unsettling Cities*. London: Routledge, 1999.
- Appleyard, Donald. "Styles and Methods of Structuring a City."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 (1970): 101-17.
- Byrne, Richard W. "Memory for Urban Geography."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31 (1979): 147-54.
- Carr, Stephen, M. Francis, L. G. Rivlin, and A. M. Stone. *Public Sp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2.
- Evans, G. W.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8 (1980): 259-87.
- Findlay, Allan M., Huw Jones, and Gillian M. Davidson. "Migration Transition or Migration Transformation in the Asian Dragon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2 (1998): 643-63.
- Hannerz, Ulf.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 Culture, People, Places*. London: Routledge, 1996.
- Kozlowski, Lynn T., and Kendall J. Bryant. "Sense of Direction, Spatial Orientation, and Cognitive Map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3 (1977): 590-98.
- Lynch, Kevin. *The Imag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A: MIT P, 1960.
- Pain, Rachel. "Space, Sexual Violence and Social Control."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5 (1991): 415-31.
- Pinheiro, José Q. "Determinants of Cognitive Maps of the World as Expressed in Sketch Map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8 (1998): 321-39.
- Sennet, Richard. "The Cities of Seeing." *Place* 5 (1988): 82-84.
- . "The Powers of the Eye." *Urban Revisions: Current Projects for the Public Realm*. Ed. R. Furgeson. Cambridge, MA: MIT P, 1994. 59-69.
- Tolman, Edward Chace. "Cognitive Maps in Rats and Men." *Psychological Review* 55 (1948): 189-208.
- Yeoh, Brenda, and Shirlena Huang. "Negotiating Public Spaces: Strategies and Styles of Migrant Female Domestic Workers in Singapore." *Urban Studies* 35 (1998): 583-602.
- 朱明琴。〈台灣菲傭與雇主的互動關係〉。碩士論文。台灣大學新聞所，1996。
- 伍德 (Denis Wood) 著。《地圖權力學》。王志弘譯。台北：時報，1996。

- 李易昆。〈他們為什麼不行動？——外籍勞工行動策略差別之研究〉。碩士論文。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研究所，1995。
- 吳挺鋒。〈「外勞」休閒生活的文化鬥爭〉。碩士論文。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1997。
- 。〈台灣外籍勞工的抵抗與適應〉。《香港社會科學學報》23（2002）：103-50。
- 吳光庭、丁榮生、李清志、林芳怡、黃華敦等著。〈中山北路——繁華・風情・歷史的街〉。《台北大街風情》。台北：創興，1996。50-110。
- 吳比娜。〈ChungShan——台北市菲律賓外籍勞工社群空間的形成〉。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2003。
- 林津如。〈「外傭政策」與女人之戰：女性主義策略再思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8（2000）：93-151。
- 孟繁周。〈台北市中山北路空間意義變遷之研究——以復興橋至圓山之間為對象〉。碩士論文。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1993。
- 夏曉鵬譯，亞太移駐勞工工作團。〈菲律賓移駐勞工在台灣處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8（2002）：219-34。
- 殷寶寧。〈「中山北路」：地景變遷歷程中之情慾主體與國族認同建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2000。
- 莊永明。〈中山北路前段風情路〉。《台北老街》。台北：時報文化，1991。180-95。
- 畢恆達。引言。伍德 viii。
- 陳正料。〈台灣外勞問題的政治經濟分析〉。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1997。
- 陳永龍暨外勞休閒消費案工作團隊。《台北市外籍勞工休閒方式及消費型態調查研究》。台北：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委託研究報告，2002。
- 許弘毅。〈中山北路聖多福教堂地區菲籍外勞的空間使用及影響研究〉。碩士論文。淡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2000。
- 傅柯著。〈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下文「脈絡」〉。陳志梧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夏鑄九，王志弘編譯。台北：明文，1986。399-409。
- 葛蘭西（Gramsci Antonio）著。《獄中札記》。台北：谷風，1988。
- 劉正元。〈非正式經濟與外籍勞工——以北部地區為主之實例分析〉。論文。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1991。
- 劉時榮。〈外勞群聚車站，近九成受訪者認屬負面文化〉。《聯合報》2000年4月27日：18版。
- 蔡宜佑。〈全球化歷程中國家角色之研究——以我國外勞政策為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勞工研究所，2000。

藍佩嘉。〈跨越國界的生命地圖：菲律賓家務移工的流動與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8（2002）：169-218。

戴伯芬、李淑媚、張景莉。〈跨越國界的文化地景：聖多福教堂週邊地區公共空間設計〉。《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十六屆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台北：台北科技大學，2004 年 6 月 12 日。286-302。

龔尤倩。〈外勞政策的利益結構與翻轉的行政實驗初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8（2002）：235-85。

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台北市外籍勞工宣導手冊》。台北：台北市政府勞工局，2002。

——。《ENJOY TAIPEI GO! GO! GO!》地圖。台北：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出版，2002。

——。《外勞 e 通訊》。台北：外勞文化中心出版，2003。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台灣地區外籍勞工管理及運用調查報告》。台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999。

周婉珍。〈外勞聚集車站成「負面次文化」〉。《中國時報》2000 年 4 月 28 日：19 版。

高泉錫。〈外勞薪資已含膳宿 明起生效 目前僅菲律賓不予同意 天主教外勞權益抨擊剝削人權 籲國際勞工組織行動〉。《民生報》2001 年 8 月 31 日：A4 版。

陳智華。〈聖十字架節遊行，中山北路菲勞起舞〉。《聯合報》2000 年 5 月 28 日：17 版。

陳淑秦。〈教堂望彌撒，外勞解鄉愁 週日早晨中山北路聖多福天主堂附近街巷充滿異國情調〉。《中國時報》1997 年 9 月 15 日：16 版。

黃士榮。〈外勞次文化 國人多反感 假日聚集台北火車站 半數民眾認為應柔性勸導〉。《民生報》2000 年 4 月 27 日：5 版。

黃如萍。〈外勞租台北車站會議室當聚會所〉。《中國時報》2000 年 4 月 27 日：18 版。

蔡慧貞。〈外勞聚集台北車站形成負面次文化：龍應台擬設外勞文化中心〉。《中國時報》2000 年 4 月 17 日：18 版。

劉時榮。〈外勞聚集車站近九成受訪者認屬負面文化〉。《聯合報》2000 年 4 月 27 日：17 版。